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色往事

党史人物忆党史

第四册 军事卷

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



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

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风雨历程

济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红色往事

党史人物忆党史

第四册 军事卷

主 编 欧阳淞 曲青山

副主编 陈 夕 刘荣刚

本册主编 李树泉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4册,军事卷/欧阳淞,曲青山主编;李树泉分册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6

ISBN 978 - 7 - 5488 - 0439 - 0

I. ①红… II. ①欧… ②曲… ③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军事史 IV. ①D23②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2993号

出版策划 丁少伦 朱孔宝

责任编辑 张伟卿 张 静

封面设计 周 倩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 编 250002

编辑电话 0531-86131719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 86116641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11千

定 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31-86131736)

目 录

李一氓	北伐和南昌起义	1
	○ 北伐战争时期,李一氓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 邓演达主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请蒋介石到会讲话。	
	○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黄埔军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党籍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只能保留一个。但他将共产党员蒋先云留在身边做秘书。	
	○ “四一二”上海工人纠察队被武装缴械解散后,蒋介石辗转找周恩来去谈话。	
欧阳毅	井冈岁月今忆	38
	○ 井冈山斗争的早期,红军指战员称呼毛泽东不是“毛委员”、“毛主席”,而是“毛师长”。	
	○ “八月失败”王尔琢牺牲,朱德为他主持追悼大会时流下了眼泪。	
	○ 一次开会时,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发了火。毛泽覃说:“共产党不是家长制!”	
崔田民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47
	○ 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黄新廷	夜渡金沙	69
	○ 黄新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历史上虽有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革囊渡江”的成功先例,但都是在政权在手、强兵对弱敌的情况下取得的。而红军在一无政权、二无援兵、长期疲劳作战的情况下,一举突破金沙天险,展示了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	
裴周玉	难忘的草地征程	75
	○ 跨越草地是长征中红军与自然斗争最严峻、牺牲最大,同时也是决定红军长征成败的一段艰难征程。	

陈鹤桥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80

-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情况众所周知,但开国少将、第二炮兵原政治委员陈鹤桥所在红军部队却经历了三次会师。对这三次会师,陈老作了详尽回忆。

陈丕显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86

- 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陈丕显跟随项英、陈毅等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力量。

刘 琦 从梨园口到星星峡——记西路军的最后一仗 178

- 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一个注释写道:“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西路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本文作者刘琦当时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西路军的最后一仗。

任弼时 山西抗战的回忆 183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任弼时从战略高度,回顾了八路军山西抗战的经过。

孙 毅 追忆平型关血战 191

- 平型关之战当日,一一五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林彪到会讲话动员。
- 林彪说:“孙毅,辛苦你一趟,到山下电台去,给八路军总部并延安的毛主席发个电报。”
- 平型关之战当晚,孙毅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

葛振林 战斗在狼牙山 196

- 葛振林,“狼牙山五壮士”之一。1941年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河北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某部第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弹尽时纵身跳下悬崖。葛振林和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他们后被

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曾思玉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201

- “铁壁合围”，是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的大部队严密交互包围的战法。《刘伯承军事文选·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指出：“敌人将以此种并列纵队造成‘铁壁合围’，企图把我军包围缩小在狭小地区而消灭之。”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的曾思玉，回顾了1942年9月八路军打破日军“铁壁合围”的经过。

钱俊瑞 皖南惨变记（节录） 207

-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一件重大事件，此事震惊中外。关于这一事件的回忆、记述和相关研究很多，但在事变不久便将事变的经过记述下来的资料并不多见。钱俊瑞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翔实记述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正如他所说：“我只写事实，别无议论。我只希望公义的冠冕还能留在人间，一切由公义来审判。”

彭施鲁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264

- 东北抗日联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时常退到苏联境内。
- 第一次伯力会议确定了联共边疆党委会和远东军司令部对中国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
- 周保中强烈反对苏方由一名苏军人员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的提议。

钟子云 从延安到哈尔滨——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 275

- 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后3天，中共中央决定派陈郁、孔原、钟子云3人先去东北。
- 北满临时省委未经批准被撤销，成立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
- 驻哈尔滨地区的苏联红军领导突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公开的党、军领导机关退出哈尔滨，准备把政权交给国民党。

陈锡联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281

-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基础。陈锡联指挥的第三纵队，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向大别山地区挺进。
- 毛泽东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曾估计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 中央军委为使中原地区各野战军集中作战，确定我军转出大别山，寻机歼敌。部队中有人说这是“前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邓小平说：这“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我的说法是：“前进一千里，又前进了五百里”。

王济生 忆济南战役 293

-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第一次攻克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坚战。这次战役由许世友指挥,歼敌11万多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计划,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

吕正操 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 302

- 俗话说:人马来动,粮草先行。辽沈战役期间,为了保证后勤物资的运输,铁路员工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
- 陈云决定,给修路工人每人每月的高粱米增加到250斤。但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铁路工人们体谅党和人民的困难,他们说:“为了支援前线,不给钱也干。”

滕海清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场上 311

- 滕海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 黄百韬被围后,蒋介石在发给邱清泉的电报中说:“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不惜一切牺牲……以解黄兵团之围。”
- 杜聿明部在黄维部危在旦夕时,深恐自己成为瓮中之鳖,不惜一切代价疯狂突围。但在我军的严密打击之下,均未成功,完全失去了突围的信心,惶惶不可终日。

张震 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319

-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正式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张震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 3月31日,邓小平在广泛听取各野战军情况报告的基础上,统筹全局,最终确定了渡江作战的决心部署。随即邓小平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
- 4月10日,中央军委来电,告之国共和平谈判可能签订正式协定,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渡江作战将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前委认为,不宜推迟渡江时间,并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
-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8时,我军发起渡江作战。21日,毛泽东、朱德正式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刘瑞龙 解放战争中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337

-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瑞龙先后负责华东、中原战场部分地区的支前后勤工作,数百万民工和数十万民兵踊跃支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自己主持的工作,他对毛泽东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有了深切的体会。

郭化若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358

-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正式开课,人民军队的第一所炮兵专业学校在南泥湾宣布诞生。炮兵学校的首任校长是被毛泽东赞誉为“党内一支笔”的郭化若。

黄乃一 老航校诞生前后 363

-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党中央、毛泽东明确要求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同志和原工程学校的部分同志进入东北,利用日军留下的飞机和设施,为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培养骨干力量。
- 蔡云翔等人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驾驶曾是汪伪政府的专机飞到延安。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 在我军接收的部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就是由林保毅(又名林弥一郎)领导的一支300多人的飞行部队。
- 美国、日本、苏联及国民党的航校培养飞行员要三四年,我们从实际出发,针对学员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主要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学,很短的时间便培养了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 首批招收的飞行学员,来自山东抗大分校,而他们的实际文化水平仅有高小程度。
- 1946年3月1日,通化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首任校长朱瑞受总部委托,宣布了我军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

李 静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仗 383

- 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初步达成。然而,在美国的纵容下,李承晚集团公然破坏协议。为此,我方除向“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提出抗议和谴责外,彭德怀建议推迟停战协议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集团以严重打击。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乔冠华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399

- 关于中国的外交,周恩来说过两句有名的话:一句是“不能置之不理”,另一句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基本态度。
- 朝鲜战争打了一年,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说,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美军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表示同意。
- 1951年底到1952年,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因为只要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战争不会停止。

张德群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404

- 张德群时任援越顾问团整党顾问组组长。
- 中国干部在战斗中带头冲锋陷阵。

○ 胡志明生活俭朴,请我们吃饭加了个炒鸡蛋。

雷英夫 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 408

○ 日内瓦会议是根据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的建议召开的。这一建议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有关规定和印度支那战争法越双方希望停战的愿望作出的。核心是解决法越双方停战的问题。

萧克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的岁月 412

- 1950年三四月之交,萧克在汉口正式接到调令,让他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
- 聂荣臻代总长握着萧克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
- 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聂荣臻和萧克,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

张蕴钰 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 425

- 1958年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在电话中对张蕴钰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讲,你立即到北京。”到北京后,副总长陈赓对张蕴钰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
- 1962年1月3日,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毛泽东亲笔批示:“很好!照办。”
-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同贺龙、陈毅在北京召集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对核试验事宜作最后布置。毛泽东指示同意在10月到11月间进行中国首次核试验。

栗在山 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433

○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完成了多种型号导弹、人造卫星的发射试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浸透着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他们从基地的勘察选址到队伍组建,从场区建设到试验设施的更新换代,从培养技术队伍到科研试验,时刻关注着基地的发展。

后 记 443

李一氓

北伐和南昌起义

- 北伐战争时期,李一氓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 邓演达主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请蒋介石到会讲话。
-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黄埔军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党籍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只能保留一个。但他将共产党员蒋先云留在身边做秘书。
- “四一二”上海工人纠察队被武装缴械解散后,蒋介石辗转找周恩来去谈话。

—

1926年3月初,我结束了在东吴大学的学习,离开上海去广州。同路人有两个,一个是欧阳继修,他离开了上海大学;另一个是朱代杰,他辞掉了淞沪铁路实习站长的职务。我们坐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只客货船。我们都取得了党组织开的去广州的介绍信,但党组织并不发路费,要由自己负担,我们只好买船票中最贱的那种散铺了。这种铺没有固定铺位,只临时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帆布床。我们的帆布床就放在船头一个拉船锚的舱位中,是全船最颠簸的地方。我们居然以乘风破浪的气概度过了几天海上生活。

到了广州,和广东区委接上头。就在这个时候,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我们对广州政治情况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缺乏准确的历史的了解。我认为这是蒋介石设下圈套,诱使李之龙上当,借以压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而且经过国民党中央的改组,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把黄埔军校和他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赶走,要求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名单交给他。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了。

二

北伐时,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但后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潜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已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党务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4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原则和具体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中央党校还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记录(见附件)。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的情况。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承下来了。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革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从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包惠僧、恽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扬清、陈瑶、贾伯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共4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宣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

事件解决后,我被约到文明路75号广东区委会所在地,同陈延年谈了一次话,决定我去政治训练部接替吴明当宣传科长。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军没有总司令部,这个政治训练部就隶属国民政府,叫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管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国民政府里面,今广州纺织路仲恺农学院就是它的旧址。

吴明,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原姓陈名公培。可能受当时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称“无名”。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又把“无”改成“吴”,把“名”改“明”,叫吴明。1928年以后,又叫陈公培了。当时他为什么离开政治训练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来他也没有为党正经工作,逐渐地跟党脱离了关系。1928年,我在上海见过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观念还不坏,说中国革命要依靠武装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队伍必须是自己的;大革命时候的武装斗争完全附属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一反动,这个武装就解体了。可见他还有一定革命气概。1931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在北平看见他。那时他已消极脱党了,在北平赋闲。1933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当国务院的参事,很消沉。在北京,我们之间虽然偶尔还有来往,但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接替吴明工作的时候,是个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没有在军事机关工作过,也没有办过报。吴明虽然卸职了,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他手上把工作接收下来,而且逐渐熟练地去完成工作。在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能够遇上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运气了。我们之间虽然不能算是深交,且为时甚短,但一提到他,我总是非常怀念和感谢他的。

我在政治训练部,名义上叫宣传科,实际上就是编那份《革命军报》。因为北伐的关系,这个政治训练部很快就改组了,陈公博也不当主任了。组织科长是周逸群。我当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四川同乡当中。如当时在广东大学医学院的王季甫、蒋留芳,在黄埔教书的欧阳继修。这样扩展开去,就认识了医学院的柯麟、黄埔的熊雄、余洒度、周恩来的兄弟周恩寿(黄埔三期学生)。因为开会关系,还认识了陈乔年。所有这些人,我离开广州以后,除王季甫、柯麟、欧阳继修以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食宿总是一个问题。在广州,我一个人租住在高第街一个商店的楼上。午晚两餐,包给财政部(现财政厅)附近一个云南馆子,菜不坏,价钱也可以。这样就顺当地直到北伐离开广州。

二

北伐时,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但后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濬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已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党务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4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原则和具体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中央党校还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记录(见附件)。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的情况。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承下来了。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革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从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包惠僧、恽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扬清、陈瑶、贾伯涛、鄞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共4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宣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

这样做,显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即使国民党的那些旧军队,经过政治训练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多少解决了军民关系问题,使北伐进军途中,大受群众欢迎。

会议期间,邓演达还请蒋介石到会训话,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蒋介石主要讲了总政治部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听总司令的。总司令既然给了总政治部应有的权力,总政治部就应该负起责任。

会议最后一天,邓演达作总结讲话。他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远,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贯彻好会议的各项决定。

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然出席了会议。邓演达两三次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下来的。这也是事实。

这次会议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如编制经费等等。关于准备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时期的战时的和战地的政治工作问题,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总政治部要统管战时、战地的国民党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是符合他一贯的集权思想的,但当时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也需要有这一条来肯定它在战时、战地的法律权威,所以在新的总政治部的编制当中,除了原来的组织、宣传科股以外,新增加了党务和社会科股,这就是为解决这个新任务而添设的新编制。

广东的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在这次北伐当中,军事上有一个加仑将军当顾问,政治部也有一个苏联顾问铁罗尼,据说是苏联红军炮兵出身,北伐从广东到武汉,他都和总政治部一起行动。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张照片,就是邓演达、郭沫若、铁罗尼3个人在武昌城外照的。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出来,他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听郭沫若说,抗日战争中他去苏联时,还在莫斯科见过他。

关于会议中讨论的宣传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广州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在广州很难招募学生参加宣传队,广东学生多了,进入湖南以后,语言上也会发生困难。可能各军、各师的政治部招了那么一点,但并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宣传大队。真正招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是在湖南长沙进行的。湖南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动员,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宣传队。但是谁当宣传大队的队长,却引起了我们和邓演达的争论。邓演达想要季方当队长,而我们则推荐胡公冕当队长,两个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产党员。最后,邓演达还是同意让胡公冕当队长了,这已经是进入武汉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会议的出席人,都是各单位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还有的是准备进入总政

治部,还没有到任的,如郭沫若;有的是非军队单位,带顾问性质的,如顾孟余、邓颖超;有的则以前是政治工作的负责人,现在已离职的,如周恩来、陈公博。总政治部各单位的负责人,都算列席,不算出席。我也是列席的。在第二次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会议记录上的李民治就是我。但在广州因为语言关系,我也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工作。总政治部出发离开广州以后就没有这个委员会了,但宣传标语的印刷一直还是由我负责。如到了长沙,利用长沙的石印店,印了很多标语;到了武汉,也在印刷厂印刷了标语,这些都是由我主管的。当时各军、师不自己印刷标语,都由总政治部印好了发下去。标语有1尺宽、4尺长,顶上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图案。

参加会议的人,有些是比较有名的,不管他们最后政治生命如何,在这里都不说明了,如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陈公博、林祖涵(伯渠)、褚民谊、顾孟余、邓颖超、周恩来;其余的人,我现在还能记忆到的,简单地作一个注释。

1. 熊雄(1893~1927年),江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役,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德国和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1927年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

2. 熊锐(1894~1927年),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3. 朱克靖(1895~1947年),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1947年作为新四军代表派到徐州郝鹏举部队,后被郝鹏举暗害。

4. 酆悌(1903~1938年),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一师党代表,抗战中任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后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介石枪杀。

5. 缪斌(?~1945年),江苏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当汉奸,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处死。

6. 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四川人,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

7. 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总政治部社会科长。

8. 包惠僧,湖北人,1920年在武汉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曾代表广东区出席中共一大。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时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脱党。

9. 李朗如,广东人,南京陆军中学毕业。广东商团的军事干事。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党代表。

这个名单是不全的。虽然都是当时在广州做政治工作的人,但我在广州的时间很短,和他们很少往来,对相当一部分人的下落不明。至于梁绍文、余程万、丁默村、

贾伯涛、甘乃光、王志远、余洒度、曾扩情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改组派，一些人则当了蒋介石的特务军官。

三

在蒋介石的口气里，北伐好像是他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山舰事件”期间，他诬称苏联顾问某某等3人阻挠北伐。这三个顾问也确实在“中山舰事件”后辞职回国了。

对于北伐，北平中央特别会议的3月14日通告（第79号）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跟着又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最后说：“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但是5月7日的中央通告（第101号）又说：“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6月，陈独秀致信蒋介石，承认：“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主张目前广东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累实力之可能”。奇怪的是7月7日陈独秀发表一篇《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向导》161册），他不认为革命有力量向外发展，而是要防备吴佩孚进攻湖南对广东的威胁。他着重在文中说了一长段这样的话：“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的响应反赤。”并且最后说：“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在广东和中共有关系的群众组织怎么样呢？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同日致中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的信，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也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

但4月10日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最后口号的第二条却有请愿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好像北伐这件事，国民党还没有什么想法，而我方提出了要求。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它的口号的第二条却提出拥护国民

政府出师北伐。就是这个农民代表大会,在其全国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报告的决议案后,又提出3条口号:革命的出路是广州政府北伐!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打倒张吴,北伐成功!这就是说,我们拥护或者赞成北伐了。可是这些在4月、5月提出口号赞成北伐的,都是广州或广东的地方工农组织。直到7月底才发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的宣言》。全总宣言对北伐的态度稍微积极了一些,但基调和陈独秀的文章大体相当。它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依照陈独秀的说法,就是北伐的时机没有成熟,不仅广东是个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南方的劳动群众也没有起来打倒北洋军阀的要求。

7月31日,中央忽然发出《通告》第一号,改口说:“现在吴佩孚不但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又说:“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又说:“在一个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 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 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 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更奇怪的是规定“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是国民会议,而不是和北伐直接有关的,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政策。

国民会议的问题是1923年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要求国民党牵头,号召全国商工农学派代表参加全国会议。因为国民党不行,就要上海总商会来当发起人。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应。1924年利用孙中山北上,中央又提出各地应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开展活动,同时党中央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定出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这个口号一直延续下来,到1926年北伐已经开始还是丝毫不变。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个口号才自然消失了。

从上面有关文件看来,对北伐这一带号召性的军事行动,党基本采取消极态度。对北伐的总的看法是,这是国民党的事情,几乎和共产党无关。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最多不过是“扶助”、“拥护”而已。这种指导思想,表面上看来是很有群众立场的,是保护了群众利益的,但是它只突出了北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没有看到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革命的胜利,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的失败。至于说时机不成熟,更是一种对当时社会形势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北伐会获得那么大的胜利,人民群众会给战斗部队以那样积极的支援。在北伐路线上,简单的定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4省,而事态的发展是直隶并没有去,河南仅在后期去打了一下奉